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

方松华 陈祥勤 姜佑福 著

学林出版社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

方松华 陈祥勤 姜佑福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方松华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 6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0167-8

I. 中… II. ①方…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676 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



作 者——方松华 陈祥勤 姜佑福

责任编辑——乐惟清 陈翔燕

特约编辑——陈晶龙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8 万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600

书 号——ISBN 978-7-5486-0167-8/B·5

定 价——3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重新认识中国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童世骏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 90 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3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60年的新中国建设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并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

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所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

2009年3月

楔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 20 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其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的相关性的讨论，彼此间发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以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使命。

目 录

楔子	1
----	---

上篇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述要

第一章 时代学术思潮之背景	3
一、儒学的衰落与西学的兴起	4
二、西学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6
三、中西融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0
第二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之开展	15
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研究	18
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26
三、瞿秋白的“互辩律的唯物论”研究	31
四、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36
第三章 学术论战之发生	40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	40
二、科玄论战	42
三、唯物辩证法论战	46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初期的历史与理论	50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5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54
三、毛泽东思想的要义与精髓	57

中篇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75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普及和指导地位的确立	75
二、新中国过渡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理论 和政治贡献	81
三、新中国过渡时期思想领域内对非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	89
四、过渡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	99
五、过渡时期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其他 理论成就	109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与变迁	118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118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化的思想和政治 表现	129
三、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若干探讨	138
四、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	143
五、学术界对美学和伦理学等问题的讨论	150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挫折和扭曲	155
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	155
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 极“左”思潮	163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	171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影射理论的泛滥	179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遭受 严重戕害	186

下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当代开展

第八章 当代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93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大讨论	193
二、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201
三、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努力与关于 “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术探讨	205
四、“三分天下”的格局与冯契的“智慧说三篇”	212
五、“返本开新”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217
第九章 当代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23
一、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积极探索	223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贡献	229
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碰撞与交流	235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不断尝试	240
第十章 当代中国学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247
一、起步: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247
二、转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研究	252
三、沉潜:对共产国际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深入研究	259
四、复兴:研究平台的重新构筑与对改革开放历程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解	267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273
一、筚路蓝缕:当代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端	273
二、规模初具: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流派、人物和 著作的介绍与研究	279
三、异军突起:三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容的成长	283
四、深度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国外马克思主义”	291
后记	293

上 篇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
学术史述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 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的理论与学术方面的贡献。相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它部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无疑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

第一章

时代学术思潮之背景

20 世纪之前,儒家思想曾经长期占据中国学术与文化的主流。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以后,传统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困境: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其民族文化的精神——儒家思想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诘难和质疑,尽管士大夫阶层大多仍然恪守着“中体西用”的见解,以期望儒学的复兴,但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次次屈辱的历史,凸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20 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大规模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过程,这一历程又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儒学在 20 世纪所面临的困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怀疑与动摇。“五四”以来新思潮之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狂飙突进、空前绝后的大时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汹涌而入,使“五四”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戟刺”而兴奋起来,中国思想界确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有诸多其他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彻底打破了儒家核心价值的传统统治与至尊地位,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发生和展开正是基于上述之历史背景产生的。

20 世纪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在学术思想方面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大时代,以西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主干的

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在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和范式的转型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世纪难题,开始了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的论战与交锋。100多年来,除了上述三大学术思潮,还有近20余种学术思潮曾经光临这个有着悠久思想与智慧传统的文明大国,期望代替儒家思想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学术思潮的涌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由西学之一种到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期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潮的争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主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与其他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一起被介绍、引进到中国来的。文化改造和社会革命是她在清末民初之所以被引进到中国的原因。正如艾思奇所说:“社会主义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的机构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历史事实,故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某种意义可以归入资本主义型的一部分。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盛行,是全世界及中国革命势力发展之结果。”^①

一、儒学的衰落与西学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担任了思想的先导,而儒学随着清王朝的覆亡,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功能亦宣告终结。这个宏大的历史过程是由传统儒学的衰落和现代西学思潮汹涌进入中国开始的。历史地看,中国学术思潮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百家争鸣的原创时期,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形成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代和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以后的绝大部分岁月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思潮,儒家的经典被尊为“经”,而研究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为“经学”。先秦儒家经由宋明,吸取了“道”、“佛”两家的精华,铸成儒学的第二个高峰时

^① 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中国哲学之发展》,载《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期——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只是在明末之后,由于儒学内部以及外部环境的原因,逐渐衰落。以致到了清末,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学术文化遂面临生存的挑战。王国维与梁济的先后自杀,意味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仅靠自身的努力,已经不可能走出这个危局,就如梁漱溟当时所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孔学羞涩不能出口。

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的变化,虽然它仍然部分传承了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思想资源,但是,作为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一个断代,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或者用中国学术思潮的周期性特点可以解释。换言之,它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冲击下,以自我的更新与创造,突破了以往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它实质上已经是中国漫长学术思潮史的一个“转型”,或者说是一种如科学哲学大师库恩所描述的“范式”的更新与革命,即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向现代学术思潮的转型。与其说这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借助于西学的外力,对已有传统的一种断裂,不如说是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历经2 000多年的学术反思,才得以回归于先秦多元文化精神高昂、思潮激荡、学术繁荣的大格局与大时代。

所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没落,既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世和兴盛创造了条件。100多年来,在中国历史舞台登场的各种学术思潮不下20余种,这种盛况除了先秦,绝为少见。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涌动,首先在于形成了西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新文学思潮、疑古思潮这样的学术思潮与流派,使我们古老的文明薪火相传,不至于文化终绝。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学术“范式”是多元的,它的转型不仅是就清代“朴学”所说,并且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思潮而言。因此,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与盛行,其首要的功绩就是对于2 000多年来的整个中国学术传统的破坏和冲击,这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潮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西化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成为中国学术思潮的主流。近年来异军突起、势力大盛的以继承儒家文化为志业

的“现代新儒家”也希望在这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学术思潮多元化的景象,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创新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二、西学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除了中国传统的衰落,还有它的“时代性”特点。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在各个学术思潮与流派的相互激荡中,确立了中国学术和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使我们的学术文化、民族精神能够在吸取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与时俱进,重新引领我们的时代前进。

我们首先要正视西学思潮的入侵,无论是西方传教士的主动输入西学,还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积极地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一言以蔽之,是他们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西方文明的信息,使我们建立起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知道了自由、民主、科学、人权和法制的当代意义与价值。西化思潮初起和兴盛于明末清初与清朝末期的中国,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大批进入中国,一些精通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不但获得了大官僚的庇护,有的甚至在北京朝廷供职,其中包括后来享有盛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于1582年(万历十年)7月抵达中国,他是历史上西方世界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较早的代表人物,其所进献的自鸣钟、《万国图志》等方物,使得明神宗朱翊钧龙颜大悦,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也由他而传入古老的中国。与欧洲商人、冒险家不同,传教士的使命主要在于文化传播,尽管实质上是为了基督教的输入,但客观上更多的却是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那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精巧的技艺和遍布乡村的教堂。他们成功的秘密主要在于“他们努力将基督教的普遍原则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使之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总之是中国化”^①。回顾西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浪

^① 参见费正清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潮,我们发现,因为康熙皇帝和满人初步建立政权,在文化上还是希望能够同化于汉人,所以在心态上大致还是抱着开放的理念,不仅对汉文化满怀敬意,对西学也极感兴趣,这是西学在明末清初得以传播和开展的基本原因。这种局面,随着清王朝的逐渐强盛而改变,慢慢形成了守旧和排外的思想,这在雍正和乾隆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而在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也逐渐形成复古排外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和情绪愈演愈烈,终于到清末内乱外患一起大爆发。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经过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使中国人由蔑视、排外的心态转而被畏惧的心态所替代。所幸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省,觉悟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西学东渐也进入到了新一轮波澜壮阔的阶段,尽管西学输入的第二次浪潮仍然是以“中体西用”的观念和洋务运动的方式开启的,也就是说这种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仍然是出于被动的形式,不过,清末的中国人毕竟走出了这艰难而又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西学思潮的兴起,无论是传教士的基督教文化输入,还是留学运动主动地向西方学习,对于老大帝国来说,都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船坚炮利”和“西学思潮”的冲击,古老的中国被迫开启了国门,而维系这个古老文明的精神文化——儒学的命运便自然地告急,儒学所面临的是2 0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因此,“西学思潮”兴起时所受到的攻击,首先就是来自于儒学的挑战,“中体西用论”就是这时期学术和政治斗争的产物。

在“西学思潮”兴起之前,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曾经有所努力。可是,鸦片战争以前,徐光启、李之藻等一班名士,对于利玛窦带来的西学,大多只是怀有学问的兴趣,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只是使得少数的士大夫开始意识到在西学中有诸多方面优于中学,但是这并未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学的基本看法,整个中国还是醉生梦死于复古排外。这时候的常见观点,是“西学源出中国”说,这种观点强调,当下的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